

隱沒的工人主體書寫：

1970 至 80 年代台灣工人文學的發展

郭航江^{1*}

摘要

1966 年高雄加工出口區成立，是台灣因應產業轉型下的結果。高雄加工出口區作為全球第一個加工出口區，加上政府「工業取代農業、低廉工資代工」之政策，社會逐漸由農業轉型為工業，導致農民向工業區或都市移動，淪為廉價勞動力，為資本家大量的出口經濟及收入。

在急速的工業化下，工人階級的群體樣貌越來越受到社會重視，同時文學界亦發生「鄉土文學論戰」，倡導文學回歸現實生活，轉向社會寫實主義。1970 年代工人文學作品通常描繪鄉下人或者小鎮居民在經濟困頓下的困局，其中不乏凸顯出台灣經濟發展係以犧牲工人階級為代價，而於此物質基礎上發展出書寫工人文學的作品。如陳映真、楊青矗、李昌憲、陌上塵等為代表作家。

工人文學主要描繪工人階級於工廠中受到雇主的苛刻對待，以及薪資微薄造成生活困頓，機械化的工廠生活，間接導致各種生命的悲劇而不可挽回。同時有夾帶有男工或者女工各種現實生活裡的心理描寫及情感刻劃，充分具體的表現出工人階級於脈絡下的真實樣貌。

近年來，工人文學作品陸續出現，但數量並不多，隱而未顯的狀況，其背後的原因及造成的現象是否因工人文學於文學範疇的擺置及經濟變遷影響下所造成。

因此，本文主要想嘗試梳理 1970 至 80 年代工人文學隱而未顯的原因。本文首先梳理工人文學的作品，及台灣經濟變遷的脈絡及背景，及其產生的社會變化及消費社會對工人主體意識及工人文學創作的影響，其次，在各種文學範疇如何將工人文學置於其中，以及消費社會興起後對工人文學發展的影響。

。

關鍵字：工人文學、消費社會、文學範疇、

^{1*}高雄用科技大學財管所畢業、現為高教工會青年行動委員會成員

一、前言

工人文學的發展，於 90 年代後的發展開始萎靡，並且消失於社會大眾的視野。過往工人文學乘載著「為工人權益發聲」、「政策制定的改善呼籲」、「實現工廠勞資平等」等等的改善社會的使命，為何卻開始在資本主義的發展下，書寫的能量卻出現疲乏，漸漸在文學的範疇失去基礎。進一步思考，現實社會綜觀今日的資本主義制度下，工人階級的權益仍受宰制，台灣勞動者持續承擔著高工時、低薪資、退休無保障等等的勞動困境，從家庭、個人安全、經濟弱勢、精神壓力的擠壓而導致多重的生活困境。「工人文學」卻難以扣連工人的生活，並且用文字書寫工人勞動樣態及心聲的文學內容的缺乏，呈現出工人文學在台灣的發展成為相當的邊緣處境，甚或少有人一提。

回顧過往工人文學作家的討論，不乏針對工人文學該怎麼發展的文學議論，在考究過往工人文學的研究上，雖然普遍將「工人文學」視為替工人發聲，將文學成為改良社會的中介及任務。並以作者的使命良知來詮釋工人文學作家的書寫精神。問題是，工人文學在台灣的客觀發展過程為何如此艱辛困難，導致其發展瞬時衰弱，則是本文的核心問題。

工人文學的發展歷程所遭遇的問題，筆者嘗試透過梳理過往工人文學作家的談論及意見表達，以及如何定義工人文學，反共國策下的制度影響。進一步發現其文化面如「工人文學」是不是「文學」，政策面在冷戰反共國策下的壓抑，以及經濟面資本主義下職業勞動的複雜性，都一再讓工人文學的發展受到阻力。

二、國民政府來台後的經濟及文化政策

1949 年國府內戰失利撤退來台，並 1950 年於韓戰爆發之後，美國杜魯門總統一改原先對國民政府採取『袖手旁觀』政策，宣布實施『海峽中立化』政策之後，並下令美國太平洋第七艦隊協防台灣，使國民政府政權得以鞏固。因此在此背景下，國民政府在經濟政策方面開始先後制定「經濟計劃」，其工業化政策為「以農業培養工業，以工業發展農業」（1953）。

依據谷蒲孝雄所編「台灣的工業化國際加工基地形成」的分析資料

從 1952 年到 1986 年的三十四年間，台灣工礦業生產平均以年平均 13% 的速度增長著，但並不是一直都保持這一速度。1953 年到 1963 年的年平均增長率為 12% 弱，而 1964 年到 1978 年(除 1973 年至 1974 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機除外)的年平均增長率為 19%。以後又出現波動甚至已以 8% 的緩慢速度增長，因此在台灣的工業化過程中，1964 年至 1978 年的十五年時間具有決定性作用。(1992，頁 8)

台灣在工業化的過程中，50 年代工業化發展順利，其工業（製造業）的附加產

值不斷提高。而細究此期間生產結構，仍以製糖業的農業加工品（恢復戰前遭破壞的工業）及棉紡工業（從大陸移植台灣的現代工業）為主的勞動密集型的輕工業。特點則為保護幼稚產業並發展最終消費品為主的內銷工業。而在此期間，國民政府亦制定了面相出口的外銷政策，透過外銷退稅（1954）、低利息出口貸款制度(1957)、外匯預存制度(1953)等獎勵出口的措施，並引進了外國資本與技術，為 60 年代出口型工業奠下基礎。

而國民政府 60 年代其原先內銷政策，遇到了島內市場太小，無法擴大產業、保護幼稚產業政策排擠企業競爭及貿易收支逆差，進而開始扶持創匯型產業。並開始朝向出口型工業轉換，其主導出口的輕工業有紡織、成衣部門為主。而此時期除了相關的「自由化政策」及獎勵投資條例(1960)等對外國投資給予在租稅上的優惠，其中最重要的即是 1965 設立的加工出口區。

而進入 70 年代，谷蒲孝雄所編「台灣的工業化：國際加工基地的形成」的分析：

70 年代的台灣經濟發展由於受到兩次石油危機的衝擊，有時經濟增長率升降波動很厲害，前一階段台灣經濟是以出口為主來發展，而這一階段是在台灣當局的主導下，扶持重化學工業，推動第二次進口替代工業的發展。因此從這邊產業政策再度轉軌，輕工業部門在工業產值中比率下降，其中食品、紡織在輕工業比重大，成衣及鞋業等新興部門開始崛起。(1992，頁 26)

在文化政策方面，國民政府在實施戒嚴制度下的背景裡及國際冷戰架構下，於 50 年代並透過國家資源系統的建立宣傳反共意識形態的戰鬥文學的文藝政策，並查禁左翼文學的作品。其中歷經各種懷鄉文學、反共復興等文學內容成為 50 年代的文學風貌。

但同時期的文學發展，亦不乏開展台灣現代詩運動的論辯。如詩人紀弦創辦現代詩雜誌，並由於提倡新詩的現代化，為 60 年代現代主義文學的風潮打下發展基礎。

根據學者蕭阿勤「重構台灣」的分析，在文學的更迭發展，進入到 70 年代，因應政治經濟的變化，一批鄉土文學作家如陳映真、王拓、楊青矗開始提倡回歸現實，相當重視現實社會內容的文學內容。而鄉土文學的特色，便是相當注重將文學介入現實的精神。常見的故事內容常以漁港、農村及工廠工人生活樣態為故事主體。

鄉土文學的故事場景經常是以工廠、農村、漁港或某個日漸凋零的城鎮，幾乎所有主角都出身卑微。同時鄉土文學作家提倡者認為，台灣是犧牲農民及工人

為代價，才得以實現經濟的快速成長，而過度依賴日本與美國投資，也讓台灣變成「經濟殖民地」。(2012, 頁 145)

因應國民政府主導經濟發展政策，台灣邁入工業化發展。將農村的剩餘人力游離出來，走向需要大量勞動力的工廠。因此大量工廠工人就成為鄉土文學作家文學書寫所關注的核心問題。在這樣的經濟結構及歷史背景下，產出了諸多工人作家及其文學作品，例如楊青矗，陳映真等。透過描繪工廠裏的工人所面臨的各種生活困境及經濟窘迫問題，與鄉土文學精神題旨「回歸現實」相互呼應。並進而希冀達到鄉土文學作家們改造社會的終極關懷。成為 70 年代文學及文化的重要演變及象徵。

而筆者透過在在國民政府意識形態及戒嚴下，外在經濟與社會的狀態與內在鄉土文學家群的作品相互之間的關係，以及鄉土文學作家作者闡述文學創作背後的理念及精神的生產場域裡，來重新檢視鄉土文學精神下的工人文學之發展。

三、鄉土文學下的工人文學

何謂工人文學,根據黃慧鳳研究論點：

所謂勞工文學，狹義的是指由具有勞工身分者創作出的文學，一般稱為工人文學；廣義的勞工文學則包含非工人作家描寫的勞工生活及其思想的文學作品。

踏進 70 年代經濟結構的發展下，工商業的急速發展，賺取了大量外匯。卻同時造成了農村人口的凋零及出走。外資與本地資本工廠的不斷設立，以吸納大量的勞動後備軍，成為當時後社會的景況。

而在文學界，歷經國府來台後 50 至 60 年代的由反共文學及現代主義文學的結構下。因為在世界局勢的變動如釣魚台的爭議，美國訪問北京以尋求關係正常化等重大事件。飽受政治高壓及文化封閉的社會，開始要求改革政治的聲音不斷蜂擁而起。此時，文學界開始關注到新時代的脈動動向，以及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現實問題。此時現代主義文學的風潮開始受到批判，其注重個人情感，逃避當前社會的現實問題，強調西方意象與句法。其精神題旨「為人生而藝術」都一再受到鄉土文學作家群的嚴厲指責。

而在鄉土文學作家群裡，培養出如楊青矗、陳映真及王拓等文學家，期楊青矗及陳映真也注意到經濟發展下，工廠工人的勞動樣態，並將改革社會的一項重要創作精神。

觀諸當時以工廠工人的勞動及生活狀況的文學作家，以及文學評論者，主要以

三種文學範疇方式來看待工人文學，分別是：（一）社會轉型論（二）回歸鄉土、回歸現實（三）作家的使命。但這忽視了在白色恐怖的禁閉及佈署下，導致工人文學主體發展受到壓抑，同時也因為左翼人士的運動過程遭受島內國家機器的鎮壓，間接導致工人階級文學的主體性被遏止、排斥及邊緣化。而為因應國策的政策壓力及經濟演變下，工人文學的寫作則朝向「勞資平等和諧，為勞工出聲，改革勞動環境」的使命精神，作家成為工人的代言者為其發聲呼喊，則是成為國府遷台後工人文學發展現實基礎。

作家楊青矗於作品「在室男」後記提到

「長大後從農村到城市，從商場到工廠時時可看到人與人之間的糾紛，人人為生活的苦鬥…這些人間的煙火事常常鬱積在我的內心，因此我的作品載的道（我把道泛指作品所表達的東西）是人間煙火卑微的道。」

從此字句上,對於楊青矗來說],所謂的「道」是透過文學這個中介來傳遞給社會大眾，以反映為生活而苦鬥的人們，代替他們表達出人間卑微的道。

而同時，而在另一方面，另一位現實主義作家王拓在其「是現實主義，不是鄉土文學」則更進一步闡述了自身對現實主義文學的理論看法：

描寫人們在現實生活中的種種奮鬥掙扎，反映我們這個社會的人的生活辛酸和願望，並且帶著進步的歷史的眼光來看待所有的人和事，為我們整個民族更幸福更美滿的未來而奉獻最大的心力的。

就以鄉土文學作家來說，反映的是現實生活每個人可能遇到的生命困境與關卡，而這些與社會生活及制度的改革息息相關，透過文學的反映功能，以達到社會進步的任務。為當時的工人文學，範疇是放置在鄉土文學範疇下來談論。這必然的客觀因素是無法擺脫國府屆時延期的肅清狀態。期間所發生的鄉土文學論戰，其核心聚焦在另一個核心上，鄉土文學是什麼樣的文學的爭論。

因此在上述鄉土文作家支持者，是以一種相對中性的質與來論辯，例如王拓的「現實主義文學」，楊青矗的「健康文學」及陳映真「作家使命」等等的歸類範疇來去擴充解釋鄉土文學的內容。在當下的歷史狀況，工人文學卻難以被獨立出來談論。而這樣的難以被提出來討論，在客觀上有國府實施戒嚴及反共的政策壓力抑制，

但這卻造成題材上以工人運動故事為主體書寫的發展弱化及延遲。在這結構下，作家往往面臨了兩種局面，一方面是國府實施的反共戒嚴體制的社會壓力，另一方面則是題材的選擇終將受到查禁審查的關押及生命安全風險。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歷史，非屬現代主義作家余光中當年發表的「狼來了」直扣作家

陳映真的文學作品是與中國大陸的「工農兵文學」遙相呼應。

在客觀的下，要求國家制定相關勞動政策規規範的以保障勞工，成為鄉土文學及現實主義文學下的工人文學樣貌及題旨。在官方定調鄉土文學為「愛國文學」、「民族文學」，以緩解政治上的緊張性，最終工人文學難以成為獨立文學。

四、反共國策下的工人文學

在國際冷戰及反共架構下，國民政府於島內實施戒嚴令，並開始佈署白色恐怖鎮壓島內左翼人士。文學界亦受到此等壓制，並 50 年代展開反共文學於島內發展，以遏阻毛澤東於 1942 年中國大陸延安表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話」所提倡的「工農兵文學」。在此國策所展開的文學生態，導致階級內容的文學發展受壓抑。觀諸日據時代即有工人階級的書寫，而發展到 50 年代卻因為冷戰反共、白色恐怖的嚴峻狀況下，因應政治氣候的狀況，呈現出文學作品反映工人階級的寫作發展停滯。在這特殊環境及歷史條件下，文學作品有走向國府反共政策需求及探討個人內心潛意識探索的發展，反共文學及現代主義文學成為島內文學場域得主要發展。

但過往的歸納工人文學發展進程亦凸顯出一個問題，其凸顯的是工人階級的意識薄弱而需要被代言，如果工人階級力量薄弱，文學更加難以有現實基礎為其發聲，例如彭瑞金的分析認為：

在台灣「工人小說」發展的侷限性是昭然若揭地，正如台灣現實小說面對社會運動的蒼白一樣，台灣的工人沒有罷工的自由，工人組織力量蕩然，那麼工人作家圍工人命運聲援的力量便十分有限。

但依據劉華真的研究論文「1970 年代勞動抗爭初探」所指出結論，

「台灣的 1970 年代絕不是一個沒有勞動抗爭的年代」(2010，頁 58)· 卻呈現出台灣勞工圖像於 70 年代絕非是受宰制被動的樣貌。諸如末日產業礦工、皮鞋工人及紡織工人都有爆發勞資糾紛及罷工的行動方案。因此吾人可以得知，工人文學並非沒有物質基礎可以書寫。但題材上的選擇以及客觀上的戒嚴制度相互影響，導致工人文學仍無法以具階級性的，戰鬥性的政治性面貌出現。相較在 70 年代工人文學的書寫，則以改良勞動政策，實現勞資和諧為主題，以實現經濟發展，社會公平的期望的故事。在國民政府在文學界的反共佈署下，以及藉由國家機器以「三民主義思想」為指導，貫穿當時的社會思想，來對抗中國大陸「馬克思主義思想」的狀態下。配合經濟轉型，設置加工出口區及工廠林立的狀況下，大量工人的產生及慘遭工廠剝削寫實生活，成為現實主義作家群關懷的焦點，並替其發聲。

在這樣特殊的歷史及結構下，「工人文學」這樣的文學範疇，其實是無法被提及的。易言之，通常在文學史的界定上，會將反映現實文學的作品與鄉土文學作品做一個並置與或歸納來討論，並指涉其作家為鄉土文學，或者現實文學。將這些文學範疇的歸類放置在 70 年文學演變的時空背景下，其實相對來說，除了讓工人文學及左翼階級意識的開展先天性受及侷限，所能開展的題材挖掘亦受到限制。

楊青矗曾於「寫作人權——兼談知識份子的過敏症」回應狼來了的爭議：

中共提倡農、工、兵文學，我們的作家就過敏而忌諱寫工人的作品，不去關心工人生活的苦樂，好像一沾上寫工人的東西，就是共產黨似的那樣令人恐怖。好多朋友警告我，你專寫工人的東西，你要小心。甚至在某些文藝座談會上有人公然叫囂『某某人專寫工人的東西，我們要注意他居心何在？有何企圖？

在文學界的「狼來了」事件，令我們更清楚工人文學發展的圖像及侷限，在當時國府配合美國帝國主義冷戰反共的結構裡，以清楚闡述階級意識，並以工人為革命主力，農民為革命的同盟軍為主題的「工農兵文學」，是難以在冷戰反共結構下生長，以避免共產主義革命在台灣的發生。從這邊我們可以清楚得知，為何「工農兵文學」可以是白色恐怖壓殺鄉土文學作家的詞語及帽子的物質基礎，亦讓鄉土文學論戰受到嚴重的壓迫，導致斷裂社會開展更多的近一步的左翼文學討論空間。因此，談論「鄉土文學」被等同於「工農兵文學」，而直接稱「工人文學」則是更無法容於當時肅殺的環境裡。在 70 年代高舉「工人主體」以及「階級意識」是不被國家自身概念所容許，工人文學發展在反共國策下的再次受到限制，

五、消費社會下的工人文學

直到 80 年代，1984 年 12 月 1 日由李喬所策劃，並於高雄舉行的「工人文學的回顧與前瞻」的座談，並邀請葉石濤、李昌憲、鄭炯明、莊金國、彭瑞金、陌上塵、楊青矗、許振江、陳坤崙、吳錦發及黃樹根等工人文學作家及勞工研究者參與。而本次座談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過於座談一開始陌上塵直接破題為「工人文學」定義，其乃「文學」的一部份，鮮明且清楚的說出工人文學有其發展自身文學領域的重要性：

關於工人文學一詞，我想在這裡提出說明：「工人文學」應該是屬於「文學」的一部分，描寫工人生活、人性的文學作品，將之統稱為工人文學，是毋庸置疑的。

在這次做座談會，聚焦在工人文學的往後該如何發展、與第三世界的相互關係，文學的寫作技巧如何精進，眾多與會者也藉這個會談思考工人文學於台灣的當代進程及發展不全的問題。葉石濤便有這樣的見解：

目前台灣大約有四、五百萬勞工，以此推論大約有一千多萬勞工家屬，在這些龐大的勞工人口當中，應該有非常蓬勃發達的工人文學才對，讀者應該也很多，因為工人本身所寫的作品給工人的感受會比較深入，但事實剛好相反，台灣自光復以來，真正大量從事工人文學創作的大概只有你們三位，至多也不會超過五、六位（意指楊青矗、陌上塵李昌憲）。

從此段談話，即可發現在進入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下的發展，工人文學開始呈現在社會面前，其文學生命的歲數卻不長久，短短十年的過程，卻在進入到 80 年代開始消寂。關注工人文學的作家們，開始意識到工人文學的寫作隊伍的缺乏，導致工人文學的產出相當不豐盛。而此次談話除了一改過往，讓談論工人文學的層次往前邁進，破除過往對工人文學的隱晦的提起，並透過社會運動推動民主化的過程，讓工人文學的議論開始有可以談論的基礎。但這次談論的主要基調，其中重要的開始思考台灣與第三世界的關係，同時題材上如何因應產業急遽變化的狀況，傳統以國營事業及紡織工廠為寫作題材，可能已無法反映現實上的勞動者的需求，吳錦發如此說：

現在台灣的工人文學，大部分描寫的還是侷限在工廠裡面，一些勞資雙方的問題，其實工人文學是很廣的，日本的源氏雞太郎所寫的，一些日本大企業裡小職員的家庭生活，或感情生活，他就是反映了一些小職員的家庭與感情生活。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工人文學還有很大的領域還沒有完全開拓。

提出了文學題材的侷限性，面臨產業變遷的狀況，工人文學的作家們該要如何重視這樣的發展，並為工人文學開拓出新的局面，吳錦發則提出一個看法：

現在台灣所面臨的問題：資訊的侵入，機械人的侵入，將來工廠裡會用很多機械人，工人失業問題便會產生，所以說工人文學的前瞻性，工人作家早就要有發現，除了寫實性，更需要注意其前瞻性。

如此帶出來的批判思考，都一再凸顯出當下工人文學已無法回應時代的潮流變化，更失去了過往使命作家框架帶來改革社會的介入性任務，而呈現一種疲乏的狀態。其科技及機械的工業發展，導致產業的更多元，服務業的興起，更讓職業的變化更複雜。

而面對工人文學的發展停滯的局面，部分作家對工人文學的定義則出現不宜樣

的看法，導致工人文學到底是不是一個獨立的文學，還是整個文學的一部份，如葉石濤即這樣回應：

現在所談的工人文學，本來並無必要標明工人文學，那是整個文學的一部份。

易言之，到底工人文學是不是一門獨立學問，在該次座談其實並未有最終的定案。但其帶出來的核心議題，像是職業的複雜性，產業的變化，題材的僵固，失去帶來改革的功能，卻仍沒有發展出更新的解方。而實際上，其實並非沒有作家注意到這一點，並且在外資進入及企業巨型化的產業變化，以及科技、知識、消費空前的巨大變化，關懷其企業裡的人與人的異化及精神狀態，作家陳映真在 1983 年的作品「華盛頓大樓系列」為一個最佳的工人文學典範，接下來透過陳映真的大眾消費論，筆者將嘗試論述工人文學發展的停滯的另一個困境：消費以及職場的多元性。

作家陳映真於大學雜誌第 175 期，對於當代文學的分析，提供一個獨到的視角可供從另一個角度分析工人文學的發展困境。該文將「消費」與「消費人」概念導入而開啟文學批判。其歸納成以下四點：（一）科技的發展（二）大量生產（三）企業規模的增大（四）行銷的發展。陳映真進一步分析，他認為今日的的科技發展是空前的，快速又巨大，生產的能量也比過往超越許多，超出了人的需要，導致商品成為社會的基礎，也讓工業企業規模不店擴增，而為實現消耗超過自然需要的商品，則必須透過更強大的傳播媒體，細密的行銷活動，來試圖影響人們的精神、文化、價值、行為的改變，進而創造龐大的消費主體，以期能實現企業所需的利潤。也就在這樣的物質基礎上，創造了「消費人」。

消費人在陳映真的概念裡，具有譬如求利之心，並且在資本主義的結構下，人成為從勞力商品化，擴展到心靈、智慧及精神的商品化。

因此，消費成為生活最重要的事情，為消費而消費，人終將失去了自主思考及創造成為「單向度人」，成為資本主義下強制消費的及控制的生命虛空的人。

我們把同時期針對工人文學的評判並置來檢視，從中可以看到，陳映真對於經濟變遷及產業的改變所產生的社會動態，以及深處其中人主體的被改造，嘗試提出挑戰及質疑，並希冀融入到文學的理念。其對當代文學的批判。其內在意義深刻提到了資本主義下所帶來的結構問題，也在此意義上，將工人文學從過往的被歸類為作家的使命、鄉土文學的範疇，對其文學的內容也將不只是替工人發聲及勞資和諧的訴求，核心關懷提升至指向對體制的質疑及批判。

陳映真的作品華盛頓大廈的「上班族的一日」裡黃靜雄離職後有一段心境描述：

他忽然感到彷彿被整個世界所拋棄了的孤單，他這才想到，這一整個世界，似乎早已綿密地組織到一個他無從理解的巨大、強力的機械裡，從而隨著它分秒不停地、不假辭色地轉動。一大早，無數的人們騎著摩托車，擠公共汽車、走路……趕著到這個大機器中去找到自己的一個小小的位置，八小時、十小時以後，又復精疲力竭的回到那個叫做「家」的，像這時他身處其中的、荒唐、陌生而又安靜的地方，只為了以不同的方式餵飽自己，也為了終於有一天也要長成為像自己同其惶惶然的「上班族」餵飽養大。

其「無數騎摩托車」、「擠公共汽車」、「走路」以致最後的概括「上班族」，其內涵的意義突顯出勞動者的形象以不僅僅是工廠裡的工人想像，而是企業的拓大，產業的多變，連同服務業的勞動者，都成為陳映真敏銳觀察且關心的焦點。在「華盛頓大樓」裡，還蓋了職場上各種行業的身分，白領的經理層級，業務推銷員、工地工人、乩童、餐廳服務生、鄉村教師、基層主管，各種職業都被捲入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不斷彼此搏鬥，為了升遷、為了生存、各自捨去自身曾有過的期待與夢想，與過去破敗、落後、愚昧割裂，進入到外商高級跨國性公司就業，希冀進入到菁英、高等、文化、進步的位階，卻依然無法掌握自身的命運，隨著公司內部高層所掌握的巨大權力，於職涯裡載浮載沉。至此，亦可從中發現，面對職場勞動的變化特性，各行各業的勞動者形象，文學該如何緊抓住這樣的問題是當前的問題。同時看似主體的消費人，其實不過是產品消費社會的客體並受其宰制。過往的職場改良，政府法制改善，工廠工人的勞動艱辛與心聲，以轉換成消費才是生存的意義，長久以來失去階級意識的基礎上。工人文學的替工人發聲的使命任務無法轉換更進一步的階級認識，前述工人座談會的發言者吳錦發即已提出了這樣的文學問題，工人文學無法抓住時代的脈動的現實問題。及侷限性。以下分別說明。

（一）工人自我書寫

在陳映真的作品華盛頓大廈的「雲」裡，陳映真更試圖在故事裡描繪出工人自我書寫的概念，像是在工廠裡的女工文秀音透過趙大姊傳話給張維傑的話：

我會努力，看看將來能不能寫出我們這種人的心情。

此種試圖提出工人自我書寫的命題，再透過「雲」文秀音的日記，以及刊登在公司刊物「麥園」的文章。係因為張經理的鼓勵，女工文秀音有了勇氣與動力去書寫，而這正是工人主體的書寫的重要性，但同時也正是照映出台灣工人書寫貧乏的困境寫照。有趣的是，文秀英在一次與友人的聚會，在等待的時候跑去書局買了楊青矗的「工廠女兒圈」及黃春明的「魚」、「鑼」，反映出當時後鄉土文學反映工人心聲的寫照，透過楊青矗「工廠女兒圈」的自序，亦提到了工

廠工人寫信給楊青矗感謝其對工人勞動問題的重視及呈現。在此都一再凸顯出工人文學替工人發聲及工人亦相當重視的歷史。而在此基礎上，陳映真則提出了更進一步的課題，工人自我書寫的問題。並提出工人階級團結及自覺的命題，面對國際資本的經濟殖民，剝削勞動者的情況，工人必須自覺得組織起來抵抗。像在「雲」裡的何大姊，報告工人籌備工會的工作之前是這樣提出的：

工會不能靠一、兩個特殊的英雄來做，那是不可能的。何況我也只是個普通工人而已。工會要成功，要靠工人有自覺，有覺醒，要靠工人相互間的團結。

「雲」為華盛頓大樓之第三部曲發表於 1980 年 8 月，內容不但有工人自我書寫的，更帶出工人階級的團結抗爭意識，批判的命題直指資本主義制度及跨國性國際資本的的侵蝕與對工人組織的強力鎮壓。將階級意識及工人行動融入在故事文本裡，將工人文學帶往邁向另一個發展。如果說陳映真這部小說所反映的是台灣 70 年代工人自主抗爭及行動，還有工人意識的拓展。並與劉華真於研究論文「1970 年代勞動抗爭初探」對照，儼然 70 年代工人絕非是毫無積極並受宰制的被動者，亦絕非沒有書寫的物質基礎。但同時在台灣，工人文學長期受到文類範疇、國家權力制度雙重抑止，導致其深度討論及書寫拓展的認識遲遲未受到相當的重視。在文學裡，工人文學是否為文學及如何發展工人自我書寫的基礎都呈現難以持續深度打造發展基礎的困境。

（二）商品消費及階級意識薄弱

從陳映真對於當代文學的批判，資本主義創造的消費制度，讓人成為只能討論消費甚麼，如何消費的客體，窮追著商品需求的無窮欲望，對自身社會、人與人、自然關係的逐漸淡薄，終究成為商品市場的工具。人的「異化」由此而生，各種複雜的訊息無法深刻理解，失去了原則的人。在資本主義下的消費社會型態，成為商品市場下的奴隸。

由此分析所對應的文學發展，陳映真亦指出台灣文學在思想、文化上的貧困：

引致這個現象的原因，我以為有兩種。一種是三十年來，我們對哲學、社會科學的傳播和書籍有一定的限制，作家缺少歷史的、社會的、批判性的思考。其次是，如前所說，在大眾消費社會中，人的「動物化」和「物化」，使人的思想無能，對於歷史、社會、人與人的關係，缺少組織化、體系化的理念，造成很多只有意見沒有信念，有很多規則而無原則、很多事實而不知其意義的作家。這是目前台灣文學急需解決的重大問題。

在華盛頓大樓第四部曲之四「萬商帝君」，就將上述大眾消費社會分析具體呈現在故事：

雖然，在理論上，大眾消費社會的登場，是和現代的大量生產相對應的。生產上還遙遙落後於西歐和日本這些富足社會的台灣，卻在消費上，事實俱在地，進入了大眾消費社會。

從耐久性消費財，例如汽車、冰箱、電視等等的絕對性增加；人民對商品的慾望不斷增長；要更長期、更多量地擁有各種消費品這樣一種有增無已的展望；瞬間主義代替了對永恆事物的和價值的追求，快樂、縱情主義取代了過去禁慾主義和節制的道德。

而消費深入人們意識、思想、文化成為最重要的元素。商品的發展，佈署在每個人生活裡的各種層面，吞沒了人們粉應現實的層面的能力，慢慢將就連鄉土也與商品結合再一起，而取代原先的意義。

「在當前，台灣有一場鄉土文學論戰」，劉福金說：「鄉土成了最流行的時髦語：文學家寫鄉土；畫家畫的是鄉土；攝影家拍攝的，也是鄉土。但是，so far，還沒有人把商品和鄉土聯繫起來。」

在消費社會的商品物化人的結構，冷漠疏離的人們，成為資本主義下一個個商品與商品的關係，工作職業隨著科技、經濟的高度發達呈現紛雜狀況。在 50 年代文化、歷史及社會失去在冷戰反共及白色恐怖下壓殺，失去左翼階級視野的自覺性，讓工人文學的發展困難重重。瞬息萬變的社會，隨著 80 年代後解除戒嚴及政治民主化道路的進程，資本的自由化、國際化、全球化結構，一再讓工人階級力量受到宰制，文學裡的工人，工人的文學再次受到排擠而邊緣化的位置上。

六、結論

本文重新爬梳了工人文學的發展歷程，並重新檢視作家們針對工人文學的議論，重新理解工人文學發展艱困的客觀問題。從國府敗退來台後，初始透過國家機器所展開的反共戰鬥文藝政策及冷戰反共下的白色恐怖，導致左翼階級視野的根絕。中期，戒嚴下的工農兵文學的敵視亦將工人文學在文學領域無法獨立生存發展而被劃為鄉土文學範疇而受到壓抑。晚近，則面對科技、社會、經濟及產業的演變型態，中被提出的「工人文學命題」發展，立即面臨到如何緊扣職場職業的多變，以及該如何反應這樣的勞動者群像核心問題。資本主義的現代性發展，佈署在台灣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各方方面面，如何喚起勞動者對於階級意識的自覺，相信對工人文學的發展有著內在密不可分的聯繫。不論是創造工人自我書寫的條件及文學作家為其代言的寫作環境，工人文學為工人階級重要的文化媒介，亦是改造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戰鬥不可或缺的一環。

參考資料

蕭阿勤，〈重構台灣〉，2012年12月，台北：聯經。

劉華真，〈台灣一九七〇年代勞動抗爭初探〉，《台灣民主季刊》，第七卷第一期，2010年3月。

陳映真，〈華盛頓大樓第一部：雲〉，1983年2月，台北：遠景。

陳映真，〈大眾消費社會〉，大學雜誌第175期。

黃慧鳳，〈台灣勞工文學〉，2007年9月，台北：稻香。

谷蒲孝雄，〈台灣的工業化，國際加工基地的形成〉，1992年6月，台北：人間出版社。

何欣，〈七〇年代的使命文學—論楊青矗與王拓〉，1978年4月，中外文學月刊第六卷·第十一期。

臺灣文藝第92期，〈工人文學的回顧與前瞻〉，1985年1月。

應鳳凰，〈五〇年代台灣文學論集〉，2004年6月，高雄：春暉。